

以「反恐同」來「反恐」： 西方關於文明與援助的兩種矛盾

陳逸婷*

摘 要

後冷戰時期，新自由主義迫不及待地在全球擴張，造成了不同區域的嚴重貧富不均，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貧窮問題。眼下有兩種明顯差異的意識形態話語益趨對立，分別為操持「反恐」的政治軍事話語與操持「反恐同」的西方 LGBT 人權話語，西方則正是透過上述兩種話語權的爭奪而得以在政治與經濟的軸向上維繫自身的支配地位。本文試圖透過分析這種話語霸權底下「文明」與「援助」之間的矛盾，來探究西方如何一方面透過「反恐同」來為「反恐」取得正當性，另一方面卻貫徹了以人道之名實行侵略政策的手段，藉以維持世界霸權的位置。

關鍵詞：反恐、反恐同、伊斯蘭、LGBT、美國利益

*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碩士，苦勞網記者。
E-mail: overcreating999@gmail.com

How “anti-homophobia” became a political tool to fight “terrorism”

Chen, Iting*

Abstract

The expansion of neo-liberalism has deepened the gap between wealth and poverty and brought poverty issues among developing countries during the Post-Cold War Era. Two distinct ideological narratives have evolved--the religious narrative of “anti-terrorism” and the LGBT-human-rights narrative of “anti-homophobia”--to politically and economically strengthen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the West over Third World countries.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analyze two sets of contradictions, namely, the contradiction within “civilization” and the contradiction within “aid”, to demonstrate how the discourse of “western LGBT human rights”, or “anti-homophobia,” can bring forth political effects on the project of “anti-terrorism”.

Keywords: anti-terrorism, anti-homophobia, Islam, LGBT, American interests

*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gender education at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Master of education, Journalist at Coolloud.
E-mail: overeating999@gmail.com

以「反恐同」來「反恐」： 西方關於文明與援助的兩種矛盾

陳逸婷

如果對近 10 年的國際時事稍加注意，不難發現穆斯林與同性戀越來越被放在了對立的位置上。

例如 2006 年，德國對有意成為德國公民的大量土耳其移民發出的「穆斯林測試」包含這樣的兩個題目：（一）你得知你的鄰居或者熟識的人發動了或者正在籌備一次恐怖攻擊，你會怎麼辦？（二）想像你的兒子向你坦言他是同性戀並且希望跟另一位男性同居，你會作何反應？

第一個題目檢測受試者對「恐怖攻擊的態度」，明顯出自把穆斯林視為潛在「恐怖份子」的意識形態；第二個題目則是檢測受試者對「同性戀的友善程度」，以確保這位受試的穆斯林不是「恐同份子」。前者的「反恐」意識與後者的「反恐同」意識之所以能夠成為西方國家對穆斯林人格審查的關鍵態度，顯示穆斯林以及其帶有高度宗教色彩的「伊斯蘭主義」，和以「西方 LGBT 人權」論述為核心所定義的同性戀，彼此之間存在著對立關係。這個測試的意義因此在於：透過「恐同」來辨認「恐怖份子」，也就是說，透過

「反恐同」來進行「反恐」。這一組過去看起來並無太大關聯的用詞逐漸浮上檯面，並形成壁壘分明的對抗陣營，正是西方文明在後冷戰時代的重要戰略手段之一。

要想闡述這種戰略手段的行程，我們首先需要了解「反恐」，也就是先要了解「恐怖攻擊」一詞的出現。「恐怖攻擊」是西方主流媒體在 2001 年美國 911 事件後開始廣為使用的詞彙，用以指稱伊斯蘭世界由聖戰份子對西方國家發起的「聖戰」。可是實際上，聖戰者 (Mujahid) 一詞在冷戰時期蘇聯入侵阿富汗的時代背景下，曾是美國援助阿富汗反抗蘇聯入侵的民兵時所稱許的「自由鬥士」。西方媒體對於這些字眼的使用相當「靈活」，隨著不同任期政府對全球戰略活動所做出的判斷建立起一種「二元邏輯」，這種二元邏輯既可以讓西方媒體成功豎立出「敵我」與「內外」，還能透過帶有普世價值道德關懷的方式來推送「正義」與「自由」的意念（殷之光，2015: 40）。「反恐」一詞所帶有的「人道主義」因而與上述提到的「自由正義」道德色彩串連起來，使得美國在經歷了 911 事件以後得以組織一連串以「反恐」為名的攻擊行動，包括 2003 年布希出兵伊拉克導致後續伊斯蘭國 (ISIS, ISIL) 在伊拉克政治勢力的擴大，以及近十年間在歐洲、亞洲與中東國家不斷發生的攻擊行動，終把「反恐」論述推向全球。說穿了，這一連串話語皆是為了鞏固「美國利益」的政治目的而服務（殷之光，2015: 39）。

在美國透過「反恐」話語成功建構出一面有利於自身政治利益的普世大旗之時，以人權（特別是 LGBT 人權）為名的另一面普世大旗也揭竿而起。關於「LGBT 人權」的討論，我想很粗略地以 2006 年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開始把「LGBT 議題」納入討論議程並發佈第一份以性傾向與性別認同為主的決議做為一個分界點。接著，

2008 年歐巴馬入主白宮，希拉蕊擔任國務卿，在他們兩人以及民主黨的領導下，美國開啟了一連串針對「LGBT 人權」的話語的爭奪戰，其中最為著名的就是希拉蕊 2011 年援引聯合國對 LGBT 提出的保護性決議，說「同志權就是人權，人權就是同志權」，成功地將西方話語中的「LGBT 人權」話語推向世界，成為全球都要認可的普世價值。

從聯合國的決議來看，這個反對一切針對性別認同與性傾向的暴力行為便是「同志友善」的核心論述：反對暴力，訴求平等對待。不僅如此，後續聯合國人權辦公室又發出內容直接提及同性伴侶以及婚姻架構文字的一份報告，其中提到「凡是國家向未結婚異性伴侶提供養恤金和繼承權益時，應向未結婚同性伴侶提供相同的福利」¹，引來非洲以（異性戀）「一夫一妻」為主要婚姻架構國家的嚴厲批評。總而言之，這些由聯合國做出的指標性決議與報告，加上美國不斷透過金援的方式限制並要求受援國家符合美國的人權標準，尤其是 LGBT 的人權標準，則是把「反恐同」話語成功推向全球的幾個關鍵因素。

西方國家以「反恐同」來操持「反恐」，這個策略已經越來越明顯。接下來，我將闡述操持「反恐」與「反恐同」話語的西方國家實際上面對的兩組矛盾：「文明」與「援助」的矛盾。

一、「文明」的矛盾：進步與落後的辯證

Joseph Massad (2007) 在《Desiring Arabs》一書中提到阿拉伯帝

¹ 這份報告內容可以參考聯合國的資料，來源取自網路：聯合國大會，2015，〈人權理事會第二十九屆會議〉，聯合國大會，URL=<https://goo.gl/8TwKuk>。(2017/3/7 瀏覽)

國第二個政權阿拔斯王朝（西元 750-1258）之前就存在很豐富的性與性別的活動與實踐，很多是以詩的形式記錄下來。Massad 援引 Salah a-Din al-Munajjid 在 1950 年代前後發佈的歷史研究，提到例如哈里發與男童之間的性活動，與稱為「sapphism」的女女性關係 (106-109)，此外，存在於吟唱女 (singing girls) 和情婦與她們的男伴之間，其性活動更是多樣豐富，顯然古早的阿拉伯女人毫不掩飾自身的情慾需求 (106-107)。al-Munajjid 早在 1950 年代就對阿拉伯世界的性活動率直的書寫，西方世界要到 1970 年代性解放運動成熟之後才有類似的論述。那麼，為什麼阿拉伯世界的歷史可以這樣引領「性書寫」的風潮呢？al-Munajjid 的意圖很明顯，他反對當時西方充斥的性壓抑氛圍，強調他的書寫是為了達到「性的解放 (sexual liberation)」，因此鼓勵人們討論性 (102)。Masaad 則認為 al-Munajjid 還原了被西方認為晦暗且缺乏文明性的阿拉伯文明，正好與西方的性壓抑做對照 (112)。

在性方面，相對於伊斯蘭文明，1950 年代的西方文明究竟是怎樣的呢？Massad 引介了一位在西方與伊斯蘭世界評價兩極化的埃及學者 Sayyid Qutb 的說法。在 1948 到 1950 這兩年間，Sayyid Qutb 被非正式地遣送至美國然後才返回埃及，在美國的這兩年中，Qutb 對當時美國社會尤其是性實踐的部分作出了犀利的分析。Qutb 對於美國人崇拜暴力、身體的力度和陽剛性的行為，以「原始主義 (Primitivism)」來稱之，他描述美國人對美式足球、摔角和拳擊以及戰爭的愛好上，既血腥、殘暴且缺乏人性，「即使在性方面也相當原始，包含婚姻跟家庭關係」(125)。Qutb 的人類學筆記中充滿對美國崇尚這種原始主義的驚訝，他指出，美國女人用很原始的方式展現女性魅力，渾圓的胸部、突出的臀部、修長的小腿...，服裝

的裁剪也恰巧露出那些會招來男性性慾的地方；女人喜歡的男性外型則是要有寬闊的胸膛、夠粗壯的手臂和堅實的肌肉線條 (125)。根據 Massad 的分析，Qutb 的觀察顯示他認為當時的西方文明跟伊斯蘭文明「根本比不了」。而且，1950 年代正是美國麥卡錫主義風行草偃的時候，只要被辨認為異常份子 (deviants) 或者男同志 (faggots)，就有可能因為對國家不忠、有叛亂的可能，而失去工作。Massad 指出，現在頻頻稱伊斯蘭信仰是「恐同」的西方，在當時其實利用了「同性戀＝蘇聯間諜」的「恐同宣傳」手法 (126)，指控同性戀為可能的叛國者。

其實「西方恐同」的例子可回溯到 1533 年英國亨利八世設置著名的雞姦法《the Buggery Act》，該法規範所有犯下「不自然性行為」者可以被判處死刑並沒收財產。這條法律在「殖民母國法律一體通用於殖民地」的規範下也適用於所有英國殖民地，但是 1967 年英國在國內廢除雞姦法時卻沒有設法在其殖民地廢止這樣反同性行為的法條。到了 21 世紀的現在，反對同性戀的聲浪從西方宗教價值系統得到極大的助力，美國基督教福音派，像是「國際祈禱者之家」(International House of Prayer) 這樣的組織，就曾拜訪非洲的在地組織，向他們灌輸反同的意識形態，譴責同性戀性傾向²。

(自命進步的) 西方提出「LGBT 人權」的「普世價值」，並以此準則試圖「拯救」那些被他們認為比自己「落後」許多的伊斯蘭人民，實則反映出他們和尼采在對基督教的批評中所說的沒什麼兩樣：

² 這邊關於福音教派如何在非洲推廣反同意識的狀況，可以參考這篇報導中的討論：Helen, 2014, 〈We Need To Talk About Colonialism Before We Criticize International Anti-LGBTQ Legislation〉, Autostraddle, URL=<https://goo.gl/dOI2Cc>。(2017/3/14 瀏覽)

如果權力感突然並且不可遏止地降臨在一個人身上……，那麼，這種權力感就會使他懷疑他自己這個人，他不敢把自己想像成引起這樣一種令人驚奇的感覺的原因——於是，他就為這種情況設想一種更強大的人，一種神性。(Nietzsche, 2003: 176-177)。

這種想像的神性讓西方文明踩上了一個與「他者」不同階層的位置，從那個位置俯瞰世界黑暗的角落，想用自己的文明照亮這些角落。當西方認為「恐同」的根源是傳統價值與保守宗教情感的時候，它沒有注意到自己與自己所批評的「保守的對方」其實站在同樣的位置上：只有自己認可的價值是高尚文明的，只有自己代表了跟人不同的「神」，其他的，都是有待掃除的「異端邪說」(Nietzsche, 2003: 180)。

如果說西方國家的「文明」自許其實掩蓋了自身的傲慢歧視，那麼它們充滿人道主義情懷的「援助」又有著怎樣的內涵呢？

二、「援助」的矛盾：發展與侵略的辯證

耶魯大學法學教授 Paul Kahn 的一段話呈現了西方核心價值以及全球秩序與價值體系的關係。他指出，這樣的價值觀並不是當代產物，而有其歷史的演進脈絡：

我們相信，沒有人在**我們**的價值話語之外。當我們描繪出一種全球秩序，便投射我們的價值在那上面。我們不可能想像一個由伊斯蘭宗教領袖領導的未來。(2005: 7, 粗體為我所加)

世界既不能由伊斯蘭領導，便只能是由西方國家領導，這是帝國主義者的野心，透過掌控各國的「發展」來亦步亦趨地達成。冷戰期間，美英想盡辦法控制具有「高度戰略價值」的中東地區，美國國務院於 1971 年出版的《美國對外關係：1947 年》歷史檔案中，便有一個章節討論 1940 年代英國和美國將對中東地區作出安排，闡明中東地區絕佳的地理位置可以連結歐洲、亞洲、非洲跟遠東，是「至關重要」的角色……，接著毫不掩飾地說：

然而由於該地區人民的行政、經濟與知識遠跟不上其被賦予的國際責任，因此，它不僅對世界的侵略者有高度價值，更是一個無法透過現代組織與科技資源來自我防禦的區域。(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1971: 569)

在這裡，帝國的手法不只是一要「侵略」以謀取自身的利益；同時也要透過對地區的「發展」來抵禦敵方的政治勢力。在同份檔案中便提到，英國應該要著力於「促進中東地區人民的生活標準，作為對共產主義的預防辦法」(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1971: 495)。「防範共產主義政治勢力的擴張」是美蘇對立的冷戰時期裡北約集團的一個重要戰略方向，到了1957年，美國保守主義的發展經濟學者 Walt Whitman Rostow 在一本名為《提案：有效外交的重點》的手冊中提到，他認為「發展」是一種可以在第三世界國家的範圍之內對抗共產主義的解決方案（殷之光，2016）。此外，Rostow 在他對「當代發展的問題與政策 (238-240)」的篇章中也曾提及，宗教與道德對「發展」都沒有幫助，先進國家要進行援助的時候，就要協助第三世界擺脫宗教與道德衝動 (239)，同時，他也

指出「韓戰的教訓使得我們認為，要防止並控制擴張中的共產勢力過於耗時，在即將來到的時代中，美國外交政策的鞏固應有賴於，直接與共產世界交手以外的新手法。」顯示了 Rostow 以發展取代直接衝突的野心 (Rostow, 1984: 239-240)。

因此，「援助」的內在矛盾就是其內部同時所包含的「侵略」與「發展」，他們分別能夠控制援助國的（一）物質層面的經濟利益，（二）象徵層面的政治利益。看似矛盾的兩個概念——「侵略」與「發展」——卻是帝國精心設計出來的戰略方針。1960 年代，美國政府的行動方針也透過政策獲得實踐，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把本來只注重貿易、忽略援助的政策走向，改為「貿易與援助」並重；甘迺迪上任後則簽署了「1961 年對外援助法案」，並成立國際開發署，開始大規模地對第三世界進行經濟援助。這種經濟援助方針被認為是美國推行外交政策的工具，透過援助來干涉受援國的政策。例如在「發展援助」的項目中，受援國要符合美國要求的「增長政策」、「自由貿易政策」與「促進私營企業發展」。上述措施達到的結果就是經濟控制。而在政治勢力方面，如中國學者王慧英在《肯尼迪（台譯甘迺迪）與美國對外經濟援助》一文中提到的，就是輸出美國的政治理念與經濟制度，來遏制以蘇聯為首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影響（王麗娜，2012: 8）。

當西方政治意識形態的敵人「蘇聯」瓦解，冷戰終結後，緊接而來的後冷戰時代在經濟模式上受到新自由主義的嚴重影響，自由市場與跨國資本對勞動力的剝削造成了貧富不均的現況。同時，在文化意識型態上則以多元文化主義為主要論述方向，促成了歐巴馬政府透過外交政策的制定把同志人權推向普世價值的時代。2011 年，在與聯合國北歐勢力推動的合作下，一紙充滿爭議的第 17/19

號決議要求各國遵守讓各種性別與性傾向的人免於暴力威脅，同年度，美國國際開發署 (USAID) 便宣布，它「強烈建議」與美方簽訂協約的合作方不只要達到對各種性別認同與性傾向者「非歧視性」的保護，還要禁止對 LGBT 受雇者的職業偏見。

歐巴馬明白表示，美方尤其要「打擊」那些使 LGBT 入罪化的處境與行為來保護脆弱的同志少數族群，因此要求外交與援助機構要以此標準向有反同志行為的國家施壓，而這些國家主要包含第三世界的非洲與部分中東地區。這樣一來，我們也許就不難察覺，隱藏在西方「LGBT 人權」政治正確話語背後的企圖，以及更大的與國際秩序關聯的成因，這些都讓「LGBT 人權」成為一種讓西方透過「反恐同」來達到「反恐」以及正當化自身之政治目的的工具。

結語：政治鬥爭中的未來？

21 世紀的後冷戰時期，西方文明透過「反恐同」與「反恐」的雙重意識形態構造，戮力掃除政治與文明的「異端邪說」，重構出帶著救贖者面具的「神」，揮舞人權大旗前來營救處於第三世界因著跟不上西方人權價值而「受苦受難」的人們。這種救贖者的姿態暴露了西方國家自身的矛盾：雖然強調自身的理性，其「人道救贖」卻帶有相當濃厚的基督教神學色彩，也因此屢受批評。當中，人類學者 Talal Asad (2003) 的分析中提到，有一部份基進的人類學者認為，現代化自由民主國家想要表現自身的世俗與理性，實際上卻是充滿迷思與暴力。這種「自由的政治」立基於文化的一致性以及人類進步的目標上，並且「它必須支配尚未這麼做的國家——若不是說之以理，就是透過武力——才可以存活」(61)，而且這些民

主國家已經準備好了，他們面對那些急需「以人道的名義」被拯救的對象，馬上可以「帶來痛苦」(62)。

拿當代的例子來做對照的話，Asad 所指稱的這些世俗化的自由國家，例如美國扶植的以色列，便以「拯救」同志人權不夠進步的「巴勒斯坦」人民的姿態，來合理化帝國主義的屠殺與侵略。Jasbir Puar (2013) 亦曾對這一點有過分析，她提到在新自由主義的經濟結構之下，國家與觀光產業的轉變如何促使同性戀成為一種「促銷手段」，不僅行銷國家的同志觀光，也行銷其國家品牌。「粉紅清洗」(pinkwashing) 一詞便揭露了這種遮掩特定事實的功能性：以色列透過其在特拉維夫進行的同志品牌行銷手段，來遮掩巴勒斯坦遭到以色列控制、土地遭到錯綜複雜的分割佔領、人民受到的種種限制……等事實 (327-328)。

然而西方文明的救贖者姿態在歷史過程中卻未必一帆風順。19 世紀末，位處第三世界之列的許多國家受到帝國主義的長期殖民，先進國家透過貶低第三世界國家為落後、缺乏文明進步、需要透過帝國者的治理來達成「文明發展」，達到侵略與殖民的目的。冷戰時期，西歐國家因為戰爭的關係，國力減弱，第三世界國家隨即起而進行民族獨立運動，脫離殖民控制。蘇聯解體後，冷戰告終，二戰以來的最大得利者美國看到了機會，老布希政府宣布推行「世界新秩序 (New world order)」，展現了美國統治世界的決心。然而，這種單極世界秩序的想像並沒有在後面的數十年間獲得實現，如今反而面對了歐洲結盟、中國經濟崛起、以及伊斯蘭國 (ISIS) 實現的政治威脅 (殷之光，2016)。

眼下，「伊斯蘭主義」與「西方 LGBT 人權」透過「反恐」以及「反恐同」話語，以及聖戰機構與全球難民危機的政治實踐與流離

經驗所產生的諸多「張力」，實則彰顯了冷戰時期第三世界的反抗力量與反抗痕跡。然而，這樣的對立在當代的媒體環境中很難得到呈現，取而代之的是政治人物利用新聞事件挑動仇外和恐伊斯蘭 (Islamphobia) 情感，用以拉攏 LGBT，以在選舉上取得支持。例如 2012 年極右翼的法國政黨候選人馬琳·勒龐 (Marine Le Pen) 在發言中指稱，法國有一些區域有越來越多的穆斯林，這些區域對女人和同性戀者「都是不好的」。雖然連法國媒體都看出這是勒龐為自己的右翼政黨「去妖魔化」、提高支持度的一種手段³，但是這些新聞操作仍然使得伊斯蘭世界獨立的歷史和區域間發生各種武裝對峙的局面消失於主流媒體。社會的知識辨識範圍只剩下 LGBT 友善的西方國家，以及來自伊斯蘭世界的「恐怖份子」，再多認識也只到難民危機便戛然而止。這種認識的斷裂正是西方主流媒體對親美話語「靈活」運用的最大成果：醜化敵對方，並抹去他們的歷史。

2017 年的台灣，同樣站在國際局勢當中，同性婚姻法案已經再度被送入立法院，就在臨門一腳的此刻，透過此文，也許我們能夠試著分辨：在地性少數的性權運動與性實踐，與西方的「LGBT 人權」的異同之處，發掘更多的可能，以拒絕自己變成那個站上制高點「照亮亞洲同志人權」的燈塔。⁴

³ 關於這邊對勒龐與法國媒體的評論，資訊取自網路：J. Lester Feder, Pierre Buet, 2017, "How France's Nationalist Party Is Winning Gay Support," BuzzFeedNEWS, URL=<https://goo.gl/qKDtQB>。(2017/3/7 瀏覽)

⁴ 「燈塔」的說法來自於 2014 年紐約時報的一篇報導，其中提及台灣相較於其他亞洲國家，例如汶萊、印尼或者新加坡，「有如不同世界」，台灣如同亞洲同性戀者的「燈塔」。此報導被台灣媒體大量的翻譯後報導傳播。來源請參考：黃兆平，2014，〈紐時：台灣是亞洲同性戀者燈塔〉，CNA, URL=<http://appweb.cna.com.tw/webm/news/firstnews/201410300125.aspx>。(2017/3/7 瀏覽)

參考資料

中文部分

殷之光，2015，〈「一帶一路」的歷史負擔：反恐戰爭與「政治伊斯蘭」困境〉，《文化縱橫》，第 3 期：36-47。

殷之光，2016，〈不確定的未來與當下恐慌：後冷戰的世界圖像〉，《文化縱橫》，URL=<http://chuansong.me/n/2308519>。(2017/3/7 瀏覽)

王麗娜，2012，《肯尼迪政府對第三世界國家經濟援助研究》，蘭州：西北師範大學。

聯合國大會，2015，〈人權理事會第二十九屆會議〉，聯合國大會，URL=<https://goo.gl/8TwKuk>。(2017/3/7 瀏覽)

外文部分

Asad, T., 2003, *Formations of the Secular Christianity, Islam, Modernity*.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61, 62)

Kahn, P. W., 2008, *Putting Liberalism in Its Pla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7)

Massad, J. A., 2007, *Desiring Arab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Nietzsche, F. W., 2003, 《反基督》，陳君華譯，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

Puar, J. K., 2013, *Homonationalism As Assemblage: Viral Travels*,

Affective Sexualities. *Jindal Global Law Review*, 4(2), 23-43.

Rostow, W. W., 1987, Developme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arshallian long period. In G. M. Meier & D. Seers (Eds.), *Pioneers in Development* (Vol. 19, pp. 227-271).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1971,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7. Volume V, The Near East and Africa*. (J. G. Reid & H. A. Fine, Eds.).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Retrieved from. URL=<https://goo.gl/802tCW>. (2017/3/7 瀏覽)